



昂贵的和平

中日马关

议和研究

吉辰 著

昂贵的和平

中日马关
议和研究

吉辰 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吉辰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9

ISBN 978 - 7 - 108 - 05107 - 3

I. ①昂… II. ①吉… III. ①马关条约(1895)—史料—研究
IV. ①D829.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046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5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献给我的外公

引言

日本山口县的下关,又名马关,是本州岛最西端的一座城市。在这处扼守本州、九州之间要道的重镇,曾上演过几场著名的历史剧。元历二年(1185)在此爆发的坛浦之战,结束了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集团的争霸,平清盛的外孙、年仅八岁的安德天皇被外祖母抱着投海自尽。庆长十七年(1612),剑客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决斗。而在元治元年(1864),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为报复“攘夷”的长州藩,将炮口指向了这里。当时,两位名叫伊藤俊辅和井上闻多的长州藩士竭力试图阻止开战,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下关的炮台被轰得粉碎。事后,德川幕府还不得不为长州藩的“攘夷”行为承担了三百万美元的赔款,这笔赔款直到十年后才被继起的明治政府还清。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上午八时许,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座船驶入了马关港。几乎同时,从广岛大本营出发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也抵达了这里。他正是当年的伊藤俊辅,如今将是李鸿章的主要对手,与之进行议和谈判。而前来迎接李鸿章一行的则是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也就是井上闻多(即时任日本驻朝鲜公使的井上馨)的嗣子。

历经二十九天的波折之后,《讲和条约》签订,即中国所称的《马关条约》。又过了二十一天,条约在烟台互换,开始生效。它的效力,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马关条约》共十一条,其内容之苛刻,在中国近代对外签署的条约中罕有其匹: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日本将在“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签署的新通商条约中

分享列强的一切在华权益……在此之前，无论是扯下“天朝”面纱的《南京条约》，还是作为城下之盟的《北京条约》，其危害都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那么，这部条约是怎样出笼，又是怎样签订，怎样批准，怎样互换的？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这就是本书所要叙述的内容。

2009年，我进入北大历史学系读研，不久便在导师茅海建教授的指示下将马关议和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对此，许多师友的反应如出一辙：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吧？

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也是对先行研究的总体观感。在整理学术史的过程中，我确实感到了先行研究数量的庞大。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也时时觉得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顾盼。在我看来，以下研究是相关成果中对本书的写作助益最大的：

石泉(刘适)先生194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出版时改名《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1〕})对政局与战争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杰出的论说，至今看来仍然难以超越。

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史》^{〔2〕}以战局为重心描绘了甲午战争的全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孙克复先生的《甲午战争外交史》^{〔3〕}对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做了全面论述，特别是在马关谈判部分大段摘译《日本外交文书》^{〔4〕}。尽管此书现在不难查阅(可在日本外务省网站阅览与下载全部电子版)，但这样的摘译工作还是为阅读提供了便利。

中塚明先生的《日清战争的研究》^{〔5〕}较早地利用了日本国立国会图

〔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

〔3〕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中日战争》续编第9册及10册收录了《日本外交文书》甲午战争部分的中译，但漏掉了这些谈判记录(第1089号文件附件)。

〔5〕 《日清戦争の研究》，青木書店1968年版。

书馆藏《陆奥宗光关系文书》等日方原始档案,对《马关条约》版本等问题做了基础性的研究。《蹇蹇录的世界》^{〔1〕}则对陆奥宗光回忆录《蹇蹇录》的版本做了细密的考订,并对陆奥的性格、心态有着引人入胜的分析。

高桥秀直先生的《走向日清战争之路》^{〔2〕}着力论述了中日开战的过程,史料之丰与考证之细都令人钦佩,本书第一章的写作从中得益不浅。

斋藤圣二先生的《日清战争的军事战略》^{〔3〕}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事战略的演进做了明晰的论述,对于理解军事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价值很大。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4〕}运用多种清宫档案,逐日重建了清政府中枢自谈判后期至烟台换约的决策过程,本书第六章第一、二节完全跳不出这篇长文的圈子。

崔丕先生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5〕}是目前国内学界唯一一篇考订《马关条约》演化过程的论文,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堀口修先生的《关于日清讲和条约案的起草过程》^{〔6〕}与《关于下关讲和谈判时日本的通商要求——以原敬通商局长的意见书为中心》^{〔7〕}对《马关条约》的演化过程做了非常完备的论述,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对此没有多少可超越的地方。

君塚直隆先生的《英国政府与日清战争——罗兹伯里内阁的内外政策决定过程》^{〔8〕}从内政的角度论述了英国在甲午战争中外交政策的变化,视角独特,有助于理解英国外交的消极。

〔1〕《蹇蹇録の世界》,みすず書房 1992 年版,2006 年再版,有中译本: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与氏著《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一戦史から消された日本軍の「朝鮮王宮占領」》中译本合刊),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2〕《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 1995 年版。

〔3〕《日清戦争の軍事戦略》,芙蓉書房 2003 年版。

〔4〕《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4 期。

〔5〕《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6〕《日清講和条約案の起草過程について》,《政治経済史学》第 230—231 号,1984—1985 年。

〔7〕《下関講和談判における日本の通商要求について一特に原敬通商局長の意見書を中心として一》,《中央史学》第 2 号,1979 年。

〔8〕《イギリス政府と日清戦争—ローズベリ内閣の内外政策決定過程—》,《西洋史学》第 179 号,1995 年。

葛夫平先生的《法国与中日甲午战争》^{〔1〕}着重使用法国外交文件论述了法国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此类研究成果。

理查德·西姆斯(Richard Sims)先生的《法国对幕府与明治日本的政策：1854—1895年》^{〔2〕}是一部大量引用法国外交文件的力作，其中第七章第五节为《法俄同盟与三国干涉》，论述了法国加入干涉的过程。由于甲午战争时期的法国外交文件未经中译发表，我又不通法文，在与战争关系最为密切的英、俄、美、德、法诸国之中，本书唯独没有使用法国的档案，这是我引以为憾的。因此，葛先生、西姆斯先生的研究对本书更显重要。

当然，相关的重要论著不止这些，此处只是就惠及本书较多者而言。我对学术史的梳理可能也有疏漏，或许有些成果未曾拜读。

对先行研究摸底之后，我仍然胆敢将这个选题进行下去，是自认前人多少还留下了一些空间。毕竟，关于马关议和的全过程，国内外学界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的论著。不过，写完二十多万字的论文定稿，又花了近一年来修订，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提不出多少创见，更不要说颠覆什么结论，构建什么框架，基本只是前人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讲得好听些，或者算是“史实重建”吧。

史实重建要靠史料。在重读现有史料的同时，我在搜集稀见史料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按图索骥，或者无心巧遇，几年间不断有所斩获。本书所征引的史料，有相当部分未经中外学界使用。

在此对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做一简介。

史料集 首先应当说明，在甲午战争这一领域，史料整理与出版工作是比较突出的。1956年，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种，《中日战争》丛刊7册出版。1989—1996年，又陆续出版了续编12册。这两套丛

〔1〕《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Richard Sims: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Bakufu and Meiji Japan 1854-95*,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8。我使用的是该书的日译本(《幕末・明治日仏関係史—1854～1895年—》，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年版)。

刊为甲午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就研究议和而言,正编中收录的《美国外交文件》、《科士达外交回忆录》,续编中收录的清宫档案、《日本外交文书》、《英国外交文件》、《美署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略》、《龚照瑗往来官电(选录)》、《科士达日记》等尤其有用。日本方面尚未出版这样的综合性史料集,但亦有可观者:宫内厅收藏的《伊藤博文文书》^[1]已被影印出版,其中的《日清事件》部分也有12册之多。

档案 战争期间清政府方面的上谕、奏折、电报之类档案,前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已有较多收录。此外,本书使用较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李鸿章全集》、《俄事纪闻》、《盛宣怀档案·甲午中日战争》等。

由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这一时期的海关档案亦有重要价值。本书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所收赫德、金登干往来函电。这一摘译本偶有缺漏,则以《中国海关密档》补充。

至于日本及列强方面,日英两国已出版的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文件(《日本外交文书》^[2]与英国外交部档案^[3])已被《中日战争》丛刊续编收录(《日本外交文书》译文有节略之处,仍有必要参考原书)。美国外交文件亦有选译,然数量较少,我使用原始文件(*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 – 1905*)加以补充。另外,俄国方面有《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德国方面有《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1] 这一史料曾以《秘书类纂》之名于1933—1936年刊行,但经过了窜改和省略。其中的《机密日清战争》(即《日清事件》之一部分)1967年再版,其余各册于1970年再版,2008年又影印出版了完整的资料。

[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27—28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3年。

[3]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E, vol. 4–5*, Frederic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9。本书收录的是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中的中日战争与三国干涉部分。

本书还使用了多种日方未刊档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公开的日本外务省、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讲和条约缔结一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档案，包括《宪政史编纂会收集文书》（原为伊东已代治所藏文件）与陆奥宗光、桦山资纪、斋藤实、河野广中等政治人物的文件。

日记 本书使用的日记之中，最重要的是翁同龢的日记（包括《翁文恭公日记》中未收的《甲午日记》与《随手记》）。这一史料对于了解清政府中枢动态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此外，较重要的还有张荫桓、王文韶、张謇、徐世昌等人的日记。日本方面，可资利用的日记较少。不过，枢密顾问官佐佐木高行的日记反映了明治天皇的言行，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的日记记录了他作为日方全权大臣参加烟台换约的全过程，史料价值都很大。

书信 本书使用的清人书信除各种文集所收者外，还有社科院近史所藏孙毓汶存札（已影印出版）、李鸿藻存札与罗丰禄家书。日人书信则有《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山县有朋关系文书》、《大隈重信关系文书》。

回忆录、自传 这类史料首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由于此书出版前曾有不少删改，本书在使用伊舍石先生中译本的同时，也参考了中塚明先生所编精校本。此外，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中方使团顾问科士达、日本外务次官林董、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第三师团长桂太郎、陆奥宗光的秘书中田敬义、为李鸿章治伤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惠与佐藤进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是相当宝贵的史料。

另外，就外交史研究而言，小山丰太郎的回忆录《旧梦谭》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但详细阐述了他刺杀李鸿章的心路历程，颇值得一读，故译出作为本书附录。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树欲静,风不止 1

第二章 难产的议和 15

- 一、清政府透露和意 16
- 二、恭王出山与列强调停 20
- 三、和战两派的论调 29
- 四、调停的继续与失败 46
- 小结 56

第三章 三渡东洋 57

- 一、德璀琳东渡 59
- 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 67
 - 使节的派遣 67
 - “全权证书”与“国书” 78
 - 广岛拒使 82
- 三、李鸿章奉使 87
- 小结 102

第四章 狮子口是怎样张开的	104
一、日本各界的议和意见	105
二、媾和条约先例的影响	123
三、条约草案的演化过程	130
小结	147
第五章 波谲云诡春帆楼	148
一、初期谈判	150
二、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	162
李鸿章遇刺	162
中日停战	176
三、议和条件的公布	184
日方的索价	184
中方的还价	193
列强的幕后运作	198
四、条约的最后谈判与签订	208
北京的争论与马关的折冲	208
列强的动向	219
条约的签订	223
小结	229
第六章 起而复平的余波	232
一、条约批准的历程	233
中枢决策的变动	233
吏民上奏的作用	238
前敌主帅的报告	244
三国干涉的影响	252
二、条约的交换	262

“完全让步”与“一步不让”	262
换约前的彷徨	266
烟台换约	273
三、保台的努力与失败	285
小结	300
 第七章 昂贵的和平	 302
 附录一：大事记	 313
附录二：《日清媾和条约案并其理由》	318
附录三：小山丰太郎《旧梦谭》	337
 征引文献	 372
一、未刊史料	372
二、已刊史料	375
三、研究著作	385
四、论文	390

第一章 树欲静,风不止

1894年,岁在甲午。

按照中国纪年,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个喜庆的年份,慈禧太后将在这一年十月初十日(11月7日)迎来她的六十大寿。这次“万寿庆典”从前年起便开始筹备,爱玩乐的老太后早就想趁此机会大张旗鼓地热闹一番。

对日本而言,这一年(明治二十七年)同样有着喜庆的意味。3月9日是明治天皇的银婚纪念日,日本政府也在加意张罗,日本第一枚纪念邮票就是为此发行的。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东邻的这场庆典。正月十七日(2月22日),礼部奏请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届时致贺并馈赠礼品,奉旨批准。贺书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本年二月初三日为大皇帝成婚二十五年吉期,麻徵克迓,欣庆同深。因念中国与贵国谊属同洲,夙敦友睦,特派驻扎贵国钦差大臣二品顶戴翰林院编修汪凤藻亲赍贺书礼物,代达通好致贺之意。惟祝长延福祚,共享升平,朕实有厚望焉。

不知是什么缘故,贺书和礼物到得很迟,直到四月十二日(5月16日)才由汪凤藻递交日本外务省。日本人的动作同样慢慢吞吞。六月初二日(7月4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请求觐见光绪帝以便答谢。初十日(7月12日),小村在北海承光殿觐见,并递交了天皇的复信:

大日本国大皇帝复大清国大皇帝:为欣庆朕结婚二十五年吉期,令贵国钦差大臣二品顶戴翰林院编修汪凤藻寄赠贵书佳品,辱领之。大

皇帝友谊敦厚，朕所不堪欢喜，兹致感谢之意，并祈大皇帝宝祚无疆。^{〔1〕}这样彬彬有礼的言辞，此时读来已显得很是讽刺。在两国君主书信的一来一回之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当年春夏之交，朝鲜东学党起义声势大盛，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而日本政府得到消息之后，抢在清军抵达前派兵入朝并进驻首都汉城，令朝鲜局势越发复杂。此后，中方不断要求日方撤军，日方则拒不承认朝鲜是中国藩属，并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尽管英、俄等国曾出面调停，但围绕撤军与改革的谈判最终仍陷入了僵局。^{〔2〕}

就在觐见光绪帝两天后，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了被日方称作“第二次绝交书”的照会（此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汪凤藻递交的照会被称为“第一次绝交书”）^{〔3〕}。对这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总理衙门当日致电

〔1〕《礼部奏日本国君主举行庆礼请颁给贺书礼物折》（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七日）、《礼部拟致日本国君主贺书》、《出使汪大臣来电》（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使臣请觐见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日）、《日本国国书》，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5页；卷14，第11页，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

〔2〕关于甲午战争前夕的中日交涉，可参见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第159页以下；田保橋潔：《日清戰役外交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51年，第110页以下；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東京創元社，1995年，第317页以下；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9页以下；戴东阳：《中日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清政府的对日政策》，王建朗、宋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以下（该文修订版见氏著：《晚清驻日使团与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1876～189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九章）。

〔3〕这份照会由内阁会议决定，由陆奥以英文电报传达给小村，汉文本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32页，又可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续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页。日文本、英文本及其中译文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明治期第27卷第2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3年，第248页；《中日战争》续编第9册，第267—268页。藤村道生先生认为，汉文本的“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一句中，“有意滋事”是主张强硬的小村擅自添加的，见信夫清三郎著，藤村道生校订：《增補日清戦争：その政治的・外交的觀察》，東京：南窓社，1970年，第596页。的确，日文本此句作“是则非贵国政府好事而何也”，没有“有意滋事”的字眼，但是在陆奥向小村传达照会的电报中，此句作“The only conclusion deducible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disposed to precipitate complications”（旁边又有汉字夹注“是则非贵国好事而何也”），直译为“根据种种情况，可推断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倾向于促进纷争”。译出“有意滋事”一语，似不能算是添油加醋。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表示“词意甚为决绝，似无转圜之机。本日已有廷寄，命决进兵之策”〔1〕。

此时清政府进行对日交涉的主要人物，上有秉承慈禧、光绪旨意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王、大臣，下有具体操作的驻日公使汪凤藻和“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而居中主持的核心人物正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凭着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军功，他从同治初年起在政坛扶摇直上，同治十一年（1872）“拜相”，授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又改文华殿大学士，得到了清代文官所能得到的最高官位。《清史稿》李鸿章传说：“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2〕这里的“枢府”与“政府”，指的是清朝权力中心军机处。〔3〕李鸿章虽不是军机大臣，却能以疆臣的身份“声出政府上”。自同治九年（1870）接替恩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以来，他已在这个疆臣之首的位子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余年。

这年正月初一，由于本年正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谕旨奖赏大小臣工。其中，李鸿章获赏三眼花翎。〔4〕

这是极罕见的赏赐。此前二百多年间，王公之外获赏三眼花翎者仅有乾隆朝的傅恒和福康安、嘉庆朝的和琳、道光朝的长龄和禧恩五人，汉大臣则无一人获此殊荣。李鸿章当时致信老友俞樾，回顾这一赏赐的历史之后写道：“鸿章特以军旅起家，仰蒙记注，遂蒙此赏，诚为故事之所稀，旷典滥膺，转益愧悚。台端旧日史官，当代耆硕，能如来示，详加考订，增入大著《丛钞》，询可续吾山之《话》，补嘯亭之《录》矣。”〔5〕字里行间，全是

〔1〕《译署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亥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17页。

〔3〕关于当时“政府”的含义，参见王宏斌：《光绪朝“政府”词义之嬗变》，《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5〕《复诂经精舍山长前河南学台俞》（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12页。《丛钞》即俞樾所著笔记《茶香室丛钞》。

踌躇满志的神色。

《清史稿》李传对此的记载则是：“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而日朝变起。”〔1〕

一个简简单单的“而”字，蕴含着修史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喟叹。

此前，李鸿章曾屡次参与重大外交事件的谈判，如侵台事件、马嘉里事件、琉球交涉、中法战争与甲申事变。在时人眼里，他承担这个角色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次交涉实在非同小可。身为当时最熟悉外国事务的重臣，李鸿章相当了解近年日本国力（尤其是军力）的蒸蒸日上。一旦中日开战，首当其冲的也将是他属下的淮军与北洋海军。这两支军队堪称当时清朝陆海军的精华，但要以此制服日军，他实在没有把握。所以，他力图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为此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委托列强调停上。

清政府中枢与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原本并无分歧。但随着日方不断增兵，中枢开始转向强硬。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上谕令李鸿章“妥筹办法，迅速具奏”。石泉先生指出：“是为中枢态度与李鸿章分歧之始。此后主战派日益活跃，其影响于中枢之决策亦日大，上谕之致李鸿章者，常系根据主战人士之奏疏而略加调停之论。”〔2〕

在小村递交“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帝根据庆亲王奕劻“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的面奏，派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总署王、大臣会同详议朝鲜事务，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又“命嗣后电报仍会商”，赋予了翁、李与枢译诸臣同等的发言权。〔3〕二人皆为清流派领袖，倾向于对日强硬，这大大影响了中枢的态度。十四、十五（7月16、17日）两日，各大臣两次在军机处会商，十六日复奏，一面主张“即飭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迟缓”，一面表示“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4〕。石泉先生认为：“此一奏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第12019页。

〔2〕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76页。

〔3〕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8—2709页。

〔4〕 《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708页；《户部尚书翁同龢等覆陈会议朝鲜之事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40页。